

郁 龙 余 编

中西文学关系源流

● 比较文学丛书 ● 比较文学丛书 ● 比较文学丛书

在观念与方法论亟待更新的时代，
文学研究需要走向世界；《比较文学从
书》沟通中外文学，引进世界新潮，探
索各国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协助您
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学
的独创特色。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

郁龙余 编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00,000

ISBN 7—5404—0026—9/I·24

统一书号：10456·188 定价：3.20元

出版说明

比较文学是一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独立学科。它诞生至今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但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已经在世界文坛上站稳了脚跟，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宽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更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民族文学的独创性。当今各国文学家对这一学科普遍具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我国早在五四时期已开始有东西方思想、政治、社会、哲学以及文学的比较研究，解放以后，停顿了较长一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比较文学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引起了重视，在短短几年间发展成一门“显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为了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比较文学在我国的进一步繁荣，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开设课程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知识更新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出版了《比较文学丛书》。

《比较文学丛书》选目注重学科本身的逻辑组合，首期工程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三）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四）国外比较文学研究概貌。

其中前三辑由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第四辑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乐黛云同志专为《丛书》撰写了总序。

《丛书》体例以本国学者对某一问题深入探索的专著为主，兼收国际知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讨专集；在方法论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研究”兼收并蓄，力求借鉴国际比较文学界已形成的各家学派之长，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把我国乃至东方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和新的文学硕果，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去，比较研究，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新的文学事业，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理论特色。

出版《比较文学丛书》在国内尚属新举，我们的希望是借此能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扎实地做点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期望听到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宝贵意见。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

比较文学的名与实

——《比较文学丛书》总序

乐 熊 云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大大改善了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懂得了必须以认识主体时间为一维的四维空间，第一次从无垠的星际世界看到人类共同生活的蓝色球体。新的认识必然引起各种观念，包括文学观念的更新，孤立、绝缘、割裂、封闭的状态已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早就预言，随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①在人类知识领域，各种学科相互切入、渗透、融合，各种边缘学科的勃兴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世界，正在走向综合。

二十世纪后半叶比较文学的繁荣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自己的领域。

最初，比较文学仅仅被定义为“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正如基亚所说：“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

^① 《共产党宣言》。

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①他们强调“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②比较文学着重研究的是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来源（渊源学）和媒介（翻译——媒介学）。

后来，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突破了这种只拘泥于事实联系的局限，人们发现并承认完全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例如关于爱情与事业的冲突，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看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也可以从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看到罗马的创建者离开迦太基皇后黛朵，造成后者死亡。另外如对于人生短暂而自然却永恒长存的感怀，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领悟，对于理想的追求与破灭等都常常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得到表现。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

从形式方面来说，一定的文学形式往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类就不可能产生于远古社会，它的出现总是与商业化、都市化和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往往都有较大的思想动荡或新思想的产生作为其兴起的背景，都需要比较自由的语言媒体，都有强大的叙事传统作为基础，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往往是从对现实客观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人物

①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页，1983年。

② 卡雷：《比较文学》序。

内心世界的刻划……他如戏剧、诗歌等文类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找到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些共同规律和划分文类的标准以及各种文类发展的不同途径等也构成了一种可比性。关于文类的比较研究被称为“文类学”。

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则是一门最近才兴盛起来的学问。例如关于大型诗文集的编排，西方多是编年序列，或以篇名的第一个字母为序。如荷马史诗就曾按希腊文的二十四个字母，编成二十四卷；品达罗斯的颂歌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中国的诗文集则大致按文体区分。如萧统的文选：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七”指特殊的文体，如《七发》、《七辩》等）……日本的《古今和歌集》又别具一格：描写自然的诗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描写爱情的诗则按爱情体验的发展顺序排列。东西方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记载也有不同方式。西方文学史很多是根据“时期”或“文学运动”来划分，中国则多半根据“朝代”、“文体”和“流派”。探索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其优劣，发挥其特长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与主题学的结合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例如杨贵妃的故事从《长恨歌》到《梧桐雨》，再到《长生殿》；王昭君的故事从《汉书》中的片断记载到《汉宫秋》到《双凤奇缘》，再到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这种同一主题的发展序列往往给我们提供文化、社会、思想风习变迁的丰富信息。在欧美文学中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发展系列。例如浮士德的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的不断改写。显然，这许多作品构成的不同系列各有自己的革新和承传，东方和西方关于这种革新和承传的过程都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

由于以上关于文学内容、形式、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比

较文学越来越向理论方面发展。正如厄尔·迈纳所说：“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①人们越来越感到文学是属于世界的，离开了对于不同文学体系的综合考察，许多文学问题就难于得到圆满的解释。文学理论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的理论只能解释某种文学体系，而是希望它既能解释西方文学，也能解释东方文学。许多学者正在探索可以解释各民族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文学理论架构。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阿布拉姆斯在他的名著《镜与灯》中提出艺术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的理论。他把这种理论归纳为一个简单的三星形：



他认为这个图形可以概括所有文学批评理论：或强调作品反映客观世界；或强调作品如何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心灵特征；或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或把这一切都视为文学的外延分析而只注重作品本身。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A·吉布斯写了《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一文，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也纳入阿布拉姆斯的架构之中。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教授在探索建立一套足以概括中西文学理论的架构方面也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

①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249页。

综合，不仅表现为类同和沟通的研究，也表现为对于殊异和差别的追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了解一个文学体系的特点，必须从一个外在的立足点，有其他文学体系作为参照系统才有可能。日本比较文学学者矢野峰人说：“大凡特性唯有在比较之中才更为炯然生辉”。^①越是不同的文学体系，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过去，人们总认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学根本没有可比性，近来，这种观念已有根本改变。例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就曾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和重视理论研究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特色来讨论十五年来的比较文学。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不少院校努力把亚洲各国文学引进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再把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各语系之内。^②无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东方文学，或从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学，或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讨东方文学现象，或以东方文艺理论来探讨西方文学现象，都会开拓文学研究领域，得出有意思的结论。例如关于易卜生的研究，如果是跟在欧洲人后面，用他们的方法来研究易卜生，很难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如果我们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研究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及发展，这种“反馈”就会大大丰富关于易卜生的研究。

综合，也包含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域内，有关各种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以及某种文学体系的迁移和流播的综合研究。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

① 《比较文学》，南云堂出版，第7页。

② 见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译文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250页。

知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①一九二三年柏林就出版过德国人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②，四十年代陈铨写过《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也出现过许多文章。目前，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学影响的文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明显诱因。五四时期，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入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决定了中国左翼文学几十年的动向。特别是五四时期，如此众多的世界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明发生撞击，作为一个众多文化相互影响、冲突、排斥、吸收、改造、变形的范例，在世界文化史上实属不可多得。事实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印度、阿剌伯文化都出现在亚洲。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还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当然，综合还包含文学与人类其他思维形式，如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综合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治曾强调“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间的关系”。^③目前，所谓“科际整合（Interdi-

① 转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61页。

② 有中译本，朱杰勤译，196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欧文·艾德治：《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1969年，伊利诺斯大学出版。

sciplinary)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突破文学研究闭关自守的状况，必须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的界限，这样，就可以为文学研究输入新的生命。我国文艺界正在探索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观念如耗散结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恰与上述呼吁相合。文学与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哲学(艺术哲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相阐发更是急待开展的重要课题。

最后，作为各科文学体系相互沟通的手段——翻译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综合、联系、交流的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比较文学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已形成自己独立而广阔的学科领域，正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我国辉煌的古代和当代文学应该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而为世界人民所共享；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学理论应该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瑰丽多彩的中国文学现象就应该说是跛脚的。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通过比较与世界沟通，在比较中研究我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殊异和类同，以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呈现自己。

从我国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开展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当务之急。经过长期的封闭与隔绝，我们特别需要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系统，重新估价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我国文学理论将在这种重新估价和认识中完成重大突破，走向更高阶段。如前所述，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对世界各

种文学比较、选择、吸收、改造，从而丰富自己的历史。正确理解和总结我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找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结合点，对于开拓我国文学视野，指导今天的创作都会有很大帮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如蒙族、藏族的宏伟史诗，纳西族、苗族的神话传说等。进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种民族文学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融合而仍保持其独立完整的规律。我国又是一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华侨在许多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学。如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美国的“美华文学”。这类文学往往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接触最前哨的种种动态，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极好标本。另外，我国地处亚洲中部，与阿剌伯诸国、伊朗、印度、日本、朝鲜和东南亚都曾有过历史悠久的交往，在文学的相互关系方面也都有很值得追寻的历史踪迹。

无论是我国各族人民文学的比较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和东方各地区比较文学的研究目前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比较文学将填补这些空白，为世界比较文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比较文学丛书》正是在以上的思想指导下编纂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深圳大学

目 录

| | |
|-----------------|----------|
| 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 | 梁启超(1) |
| 《西游记》考证(节录) | 胡适(7) |
| 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 | 许地山(12) |
| 《痴华鬘》题记 | 鲁迅(57) |
|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 陈寅恪(59) |
|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 | 陈寅恪(63) |
| 《天问》里的印度诸天搅海故事 | 苏雪林(69) |
| 论佛典翻译文学 | 周一良(100) |
| “猫名”寓言的演变 | 季羡林(109) |
| 印度文学在中国 | 季羡林(115) |
| 《西游记》和《罗摩延书》 | 吴晓铃(134) |
| 毗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 | 柳存仁(149) |
| 观世音菩萨之研究 | 李圣华(196) |
| 《五卷书》译本序(节录) | 季羡林(212) |
| 《沙恭达罗》译本新序 | 季羡林(218) |
|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 季羡林(239) |
| 中印文学关系举例 | 糜文开(248) |
| “木鸟”——一个影响深远的 | |
| 民间科学幻想故事 | 刘守华(270) |

- 从印度的《罗摩衍那》到泰国的《拉玛坚》 李 洪(285)
- 和傣族的《拉戛西贺》 李 洪(285)
- 《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
《诗经》的“雅”、“颂” 金克木(304)
- 冰心与泰戈尔 方锡德(323)
- 说静
- 从泰戈尔的静来看陶渊明的静 艾 岩(349)
- 禅与诗人的宗教
- 中印文学思想交流一例 朱维之(362)
- 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
- 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 阖云翔(373)
- 汉译佛典中的印度文学 郁龙余(416)
- 编后记 郁龙余(425)

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

果 启 超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其显绩可得而言也。

(第一)国语实质之扩大

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派”之用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如前所述道安、彦琮之论译例；乃至明则撰《翻经仪式》、玄奘立“五种不翻”，赞宁举“新意六例”，其所讨论，则关于正名者什而八九。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

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

译家正名之结果，更能令观念增其正确之程度。常读符秦译之《阿毗昙八犍度论》，其第一篇第三章题为《人跋渠》，第二篇第三章亦题《人跋渠》；及唐玄奘重译此书名为《发智论》，其第一篇之《人跋渠》，则改题为《补特迦罗纳息》；第二篇之《人跋渠》，则改题为《有情纳息》。（“跋渠”“纳息”皆译音，即他经所译“品”字之义）考第一篇原文为 Pudgara；第二篇原文为 Sattva Varga；据《玄奘音义》卷二十二释“补特伽罗”云：“梵本补（Pu）此云数；特伽，（dga）此云取；罗（ra）此云趣。数取趣，谓数数往来诸趣也。”此殆近于所谓灵魂者；而其物并非“人类”所专有。《唯识述记》卷一释“有情”云：“梵言萨埵，（Sattva）有情识故，能爱生故。”此殆指凡含生之类而言；故旧本亦译为“众生”。然则此两字皆不能以旧语之“人”字涵之明矣。而初期译家，口笔分功，不能相喻。闻梵师所说，义与“人”近，则两皆以“人”译之。读者为旧来“人”字观念所囚，则与本意绝不能了解。且彼中两语，我译以同一之词，则两观念之区分，无由辩晰。逮新译出，斯弊乃祛。盖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淹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职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

(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覆牒前文语。（七）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斲。稍进而自感一种调和之美。此种文体之确立，则罗什与其门下诸彦实尸其功。若专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此译家，亦竟未有能过什门者也。

贊宁论译事云：“声明中（一）‘苏漫多’，谓汎语平语言辞也。（二）‘彥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意住于义不依于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诸类所能解故。……折中适时，自存法语，斯得译经之旨矣。”（宋《高僧传》卷三）“彥底多”者，即古雅之文；“苏漫多”者，即通俗之文也。佛恐以辞害意且妨普及，故说法皆用通俗语。译家惟深知此意，故遣语亦务求喻俗。吾侪今读佛典，诚觉仍有许多艰深难解之处。须知此自缘内容含义，本极精微，非可猝喻。亦如近译罗素安斯坦诸述作，虽用白话，原非尽人能解也。若专以文论，则当时诸译师，实可谓力求通俗。质言之，则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也。（试读什译法华譬喻品信解品等篇当知此言不